

■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宋元明清

巴蜀书社

译注 谈蓀芳

审阅 章培恒



(川) 新登字008号

责任编辑：梅锦辉
封面题签：启 功
封面设计：陈世五
插图：罗二虎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通鉴纪事本末选译

谈蓓芳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10.25 字数170千
1991年10月第一版 199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ISBN7-80523-358-6/Z·28

定 价：140.00 元 (第二批50种)

Y
K204.5
7

通鑑紀事本末選譯

北京圖書館藏

B

974805

国家教委古籍整理
『七·五』规划重点项目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马樟根、安平秋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础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的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

文力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我国很早就有编纂历史著作的传统，古代的史学家为我们留下来的史学著作之丰富，在全世界各个国家中是首屈一指的。我国第一部完整的编年体史书，是相传由孔子编定的《春秋》，这是一部断代的编年史，只记录了春秋时期的史事。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是《史记》，《史记》的记事，起于上古，止于司马迁所生活的汉武帝时期，是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到北宋时，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其记事上起战国，下迄五代，虽然没有战国以前的史事，但如把标准稍稍放宽一些，不妨将它当作保存至今的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它与《史记》都是我国史学史上的杰构。《史记》由“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五部分组成。前三

者基本上是人物传记，“书”则具有专史的性质。纪传体的好处是使读者能较清晰地看到历史人物的面貌，但如要较具体地了解历史的演变过程，却必须由读者自己把“本纪”、“世家”、“列传”的记事综合起来，这就颇为不便了。《资治通鉴》所用的是编年体，逐年记述当年的大事，就显示历史的具体演变过程来说，比纪传体要清楚得多。当然，历史人物的较为完整的面貌，在《资治通鉴》中就无法看到了；但好在这也并不是通史性质的著作所必须完成的任务。

作为一部历史著作，《资治通鉴》的最大弱点在于不能使读者方便地了解每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经过。因为每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都由种种具体事情所构成，而且往往前后延续几年甚或几十年，而在这几年或几十年内，还有许多其他的重大历史事件在进行，所以在每一年的记事中，都必须将分别从属于不同历史事件的具体事情记录下来，却又不能一一注明这些事情各属于什么事件。加以很多历史事件又是断断续续地展开的，有时是并行的，有时又是前后相错的。因此，要从《资治通鉴》的每年纪事里理清每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脉络，实在是很花力气的事。

为了弥补《资治通鉴》的这一缺陷，南宋时的

袁枢编了《通鉴纪事本末》。袁枢（1131—1205），字机仲，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县）人。乾道七年（1171），任太学录，后因不满于政治现状，要求到地方上去做官，遂于乾道八年被任命为严州教授。他本来就喜欢读《资治通鉴》，因而也深深感到其内容浩博，难以掌握，到严州后就着手编纂《通鉴纪事本末》。到淳熙元年（1174）春天，他的老朋友、著名文学家杨万里经过严州，他已把书编成，共四十二卷，就请杨万里写了篇序。淳熙三年，此书在严州刊行；至南宋宝祐五年（1257），又在湖州校正重刊。因前一种本子字较小，后一种本子字较大，所以被分别称为小字本和大字本。

此书刊行后，受到宋孝宗的赏识，袁枢也因此而又调到中央去做官，在孝宗时最高做过权工部侍郎兼国子祭酒。光宗时知常德府。宁宗时擢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不久受言官弹劾而免职。因他敢于直言，所以在仕途上一直不怎么得意。

《资治通鉴》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所记史事的时间跨度达一千三百几十年，《通鉴纪事本末》则从其中选了二百三十九件重大的史事，对其过程作了较详细的叙述，把很多具体事情都纳入这些历史事件之中，并为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一一标目。尽管《通鉴》的有些记事无法附属于这些历史事件，

因而未被收入，但《通鉴》中过程繁复的重大历史事件，却已基本网罗在内。而且由于把原书中与每个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的各种事情都按时间的顺序编排在一起，各重大事件本身的脉络及内部的因果关系都显得相当清楚，读者很容易掌握。所以，《通鉴》的上述弱点确因此书的出现而得到了弥补。

当然，此书不能代替《通鉴》。除了它不能包括《通鉴》所有的全部史事外，还有三个原因：其一，此书把战国至五代的历史分解为二百几十个大事件，这就使人难于把握历史的总体面貌以及历史进程的全部复杂性，其二，就重大的历史事件来说，原也是彼此关联的，但由于此书是分别地叙述这些大事件，相互间的关联就被冲淡了。例如，东晋末期刘裕获取帝位、建立宋王朝的事件，此书立了《刘裕篡晋》一题来作专门叙述，又另立《刘裕灭南燕》、《刘裕灭后秦》二题来叙述他在东晋时所建的这两大功勋，至于刘裕推翻桓玄统治的具体过程则在《伪楚之乱》中来交待。其实，若没有平桓玄、灭南燕和后秦的事，刘裕的篡晋是根本不可能的。现将这些事件分列在不同的题目之下，其相互关联被冲淡了，一般的读者难免对刘裕何以能在这么短的时期内轻易地篡夺成功感到难以理解。其三，此书所收入的，是有本末可纪的历史事件；至

于各种具体制度的变迁却并不涉及，即使《通鉴》里原有这方面的材料，也删而不录。而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这却是一个绝不应忽略的问题。所以，《通鉴》与《通鉴纪事本末》两书是相依相存的，但也是不能相互能取代的。如果不是为了研究历史，只是想增加些历史知识，不妨读读《通鉴纪事本末》，因为此书读来能使人感到兴味盎然。

此书不但弥补了《通鉴》的上述缺陷，而且对历史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为《通鉴》的这种弱点乃是编年体史书所共有的，此书一出，一些学者恍然大悟：原来编年体史书的弱点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弥补。于是从南宋到清代，《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左传纪事本末》等一批书陆续编成。接着，人们又进一步推而广之，将这种体裁用来弥补纪传体史书的不足。《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之类的书也问世了。这些书除《明史纪事本末》早于《明史》成书，是一部独立的史学名著之外，都跟《通鉴纪事本末》一样，是依附于另外一部书的。但在这种体裁的优点显示出来后，人们觉得完全可以用它来直接记述一些历史事件，而不必依附某一部原书，因而又有了《三藩纪事本末》一类的著作；至于采用纪事本末的体裁而不用“纪事本末”作为书名的史学著作就更

多了。总之，随着《通鉴纪事本末》的出现，在我国的史书中，除了基本上以人物为纲的纪传体、以年月日为纲的编年体外，又多了一种以事件为纲的纪事本末体。袁枢编纂此书，虽然在史料上完全以《通鉴》为依据，并无增补，在文字上也多用《通鉴》原文，但他创造了一种新的史学体裁，从而在我国的史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以选译的形式将此书向广大读者介绍，应该说是值得的。

现在，简单地谈一下，《通鉴纪事本末选译》的编选原则。

《通鉴纪事本末》一书的最大特点，是通过历史事件的叙述来显示作者的所谓“治道”。即如何治理国家，驾驭臣民，维护专制统治。今天读者中的大多数人对他所看重的治道未必有多大兴趣。因此，在选译本书时，更多的是考虑到一般读者的需要，定了以下几条原则：第一，在篇幅容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多介绍一些历史事件，以增加读者的历史知识。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本书入选的各篇——除《祖邀北伐》以外——都有所删节，以便节省些篇幅。《资治通鉴》原书本有主编司马光所写的对历史事件的不少评论，用来宣扬其政治主张；它们都以“臣光曰”开头。袁枢的政治见解与司马光基本

一致，这些评论在《通鉴纪事本末》中也保留了下来，成为其阐明“治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因本书对原书中的“臣光曰”都予以删去。第二，由于《通鉴纪事本末》的记事上起战国，下迄五代，本书所选的历史事件在时间上也力求有合理的分配。但仍为篇幅所限，战国和五代的历史事件未能选入。此外，三国的历史事件中，没有东吴的；南北朝的历史事件中，也只选了南朝的。这都很令人遗憾。但好在本书的其他史籍的选本中，对这些时期的历史事件有过不少介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第三，历史事件本身是丰富多采的，本书所介绍的历史事件，在类型上也努力做到多样化。因而在本书中，既有《豪杰亡秦》那样天翻地覆的剧变，也有《巫蛊之祸》那样表现宫廷内部矛盾的事件；既有对君主忠心耿耿的英雄诸葛亮，也有取皇帝而代之的豪杰刘裕；既有关涉经济的《奸臣聚敛》，也有在政治上相互倾轧的《朋党之祸》。第四，《通鉴纪事本末》叙述历史事件，篇幅长短不一。为了显示原书在形式上的特点，本书对长、中、短篇均酌量选入。长篇以《朋党之祸》为代表，短篇则以《祖逖北伐》为代表。第五，本书入选各篇所叙历史事件，在时间上的相互距离多数都很遥远。为帮助读者对这些历史事件的理解，在篇首的

解题中力求将其与上一篇所述历史事件联系起来。

限于功力，笔者在选译《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时，难免有不妥当和错误之处，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

顾问

周 林 邓广铭 白寿彝

主 编

章培恒 安平秋 马樟根

编 委

(均按姓氏笔划多少排列)

马樟根 平慧善 安平秋 刘烈茂 许嘉璐
李国祥 金开诚 周勋初 宗福邦 段文桂
董治安 倪其心 黄永年 章培恒 曾枣庄

(以上为常务编委)

王达津 吕绍纲 刘仁清 刘乾先 李运益
杨金鼎 曹亦冰 常绍温 裴汝诚

(以上为编委)